

找出“灰犀牛之母”方可杜绝之

最近，一个新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灰犀牛”。什么是“灰犀牛”呢？这个词来自于米歇尔·渥克的同名畅销书，本意是那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灰犀牛”很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地方债务、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都完全符合“灰犀牛”的特征，有较大概率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我们当然需要想方设法去制服这些“灰犀牛”，但还需找出“灰犀牛之母”，从根本上杜绝“灰犀牛”的产生。

那么，中国经济的“灰犀牛之母”是什么呢？就是落后的发展理念。“发展”一词从其本意上讲，是有丰富的内涵的，它包括技术的改进、产品的丰富、经济结构的优化、环境的改善，以

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多个维度。但在很多人看来，“发展”就等同于“增长”，等同于GDP的提升，“发展是硬道理”就意味着千方百计拉动GDP的增长。

无论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地方债务的累积、银行不良资产率的提高，还是不平等程度的加大、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灰犀牛”事件归根到底都源自这种发展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这种发展理念称为“灰犀牛之母”毫不为过。

应当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发展”和“增长”的同一性是比较高的。因此，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往往也是最能促进发展的战略。即使它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但与其产生的

正面效果相比，这依然是次要的。不过，当我国的经济已经迈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后，“发展”和“增长”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显露出来。

根据经济规律，如果不发生技术条件的重大改变，那么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就会随着其收入水平逐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有思维，试图用加杠杆、加刺激的方式让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那么结果就一定是泡沫出现、风险增加，“灰犀牛”肆虐，其产生的危害，将会远远高于增长本身带来的收益。

要根除“灰犀牛”，归根到底还是要摒弃落后的、不合理的发展理念。将以增长为核心，转变为综合平衡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

《新京报》2017.8.3 文/陈永伟

别让大数据变成“禁铜环”

《澳大利亚人报》近日报道称，某社交媒体通过监控分析640万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青年发布的信息，判定其情绪和精神状态后提供给广告商，使后者向“情绪脆弱”的用户精准推送广告。尽管该社交媒体对此表示道歉，但依旧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似乎接到了精神疾病强行诊断书”。

大数据时代，人们渐渐习惯了个人日常行为、选择和喜好被精准捕捉，并因此得到私人订制般的社会服务和便利的生活。但对普通用户而言，在享受利

好的同时，个人信息暴露造成隐私权被侵犯，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数据贩卖、安全漏洞等导致个人数据在互联网上“裸奔”的事实令人不寒而栗。另一种更需要引起警觉的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结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令人们对隐私的让渡变为对生活日益失去自主权。

正如英国《卫报》所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人类本身就已经变成产品。大数据对人们的了解日益详细，对每个人也产生了基本判断，并对他

们的喜好做出“精准”预测。人们喝着它推荐的饮料、穿着它选择的衣服、过着它认为“适合”的生活。讲述科技造成人性流失的英国电视剧《黑镜》曾这样演绎社交媒体：大数据评分成为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甚至决定人们是否有资格坐飞机、能租什么样的房子，评分过低的人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

显然，大数据理当是能够化为新动力的源泉，而不该是限制生活和思维拓展的禁铜环。在大数据无处不在的今天，人们如何摆脱“被大数据包装”的命运，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倒成了一个新鲜的课题。

《人民日报》2017.8.3

拒收现金误读了无现金社会

商家拒收现金，只接受移动支付方式，到底有没有违法呢？随着无现金社会渐成气候，相关争论不绝于耳。央行人士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属于违法行为。

移动支付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商家公然宣称拒收现金，只接受移动支付方式，就引起了广泛质疑。移动支付是潮流，“无现金社会”的来临也是客观现实，但是，“无现金社会”并不是完全拒绝现金、拒收现金的社会。拒收现金本身就是对“无现金社会”的一种严重误读。

一方面，即便移动支付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市场交易、成为商业消费支付的主流，但是在现实中人们总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手机没电了、网络流量不足了等，难道

这样我们就不消费了吗？另一方面，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群体，根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如果商家拒收现金，那么他们的消费权利如何保障？

说到底，“无现金社会”不是拒收现金，只是提倡消费者采用移动支付手段。对“无现金社会”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移动支付和现金支付在长时间内并行不悖。如果有商家为了自己的方便，拒收消费者的现金，并因此拒绝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

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所以说，拒收现金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法制日报》2017.8.4 文/苑广阔

患者看病“货比三家”加重医患负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至今还记得，他给一个普通患者很认真地看完病以后，这位患者又拿出了10个在不同医院看过的病历本对他说：“姜大夫，您说的和一个大夫说的一样，但是和另外几个大夫都不一样，我应该相信谁？”姜玉武感慨道：“在儿科，这种浪费资源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个病人反复看10位医生，就意味着他占用了其他9个病人的医生资源。”

在现实中，同一个患者，同一种病症，在这家医院检查完又去其他医院做同样的检查，在这家医院看完医生，又去另外的医院看医生

的情况并不少见。买东西可以“货比三家”，但是看医生也“货比三家”，造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医生荒”。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患者对自身的疾病过于担忧和焦虑。这是公众更加重视自身健康的表现，值得肯定，但是过犹不及，并不值得提倡。另一方面，则是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缺乏信任，一旦两个或者是多个医生给出的结论不一致，就更加担心和焦虑，另寻高明，结果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但是多数患者并不清楚，即便是同一个病人的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医生眼里，也会有不同的描

求职青年李文星之死，正在让人们复盘“魏则西事件”的恐慌。23岁，工科毕业生，出生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通过招聘平台“BOSS直聘”求职，拿到了名为“北京科蓝公司”的公司Offer——故事到此为止都是平常。直到，7月14日，他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被发现，“符合溺水死亡特征”。而后，“北京科蓝公司”是冒名招聘公司的事实被发现，招聘平台因为“李鬼”（疑似传销组织）站台而陷入众矢之的。

互联网上无新事,且看——

求职者李文星之死

联系国内互联网招聘平台的大生态看，就会发现，这扇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去年记者曾做过实验，在“58同城”上注册招聘，只需十分钟和一个手机验证就能搞定。李文星事件后，南都记者在“BOSS直聘”上做了同样的实验，“中间一路秒过，没有任何资料审核要求”、“3分钟就开始收到简历”。可以说，平台几乎处处是陷阱，而每个年轻的求职者，就像在凭着运气趟地雷阵。

互联网似乎升级了国人生活的叙事，但就像百度搜索依旧把年轻的魏则西引向了当年在街巷里摇铃、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的游医，新兴的招聘平台一样充斥着跳大神式的前现代骗局。这让人们看到了网上和网下生态的同构性，单纯技术更新本身，对于法治和社会治理症结的无力。

因为技术一维向前，时常会让人产生社会也在线性进步的印象，让人产生监管手段与法治环境都在自然提升的错觉。炒各种网络概念的招聘平台，实际上只是把原始的中介、劳务市场平移到网络之上，换了个地方搭场子而已。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灰色地带仍保持了监管飞地的角色，不出事不管，小事小管，大事大管。总有人愿意赌，不会出现李文星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作为不见面的经济和社交模式，互联网经济的基座应该是信用体系健全、契约精神成熟的现实社会。但从魏则西到李文星，“不见面”放大了信用体系不健全和治理失效的现实症结，使那些传统伎俩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防不胜防。

李文星的遭遇，令人愤怒。互联网上无新事，令人气馁。

光明网 2017.8.3

在学术界，“抄袭”二字，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指控。2016年，因在论文中整段抄袭外国作者译文而被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的于艳茹，就是这样一位抄袭者。

法学家们为什么站在抄袭者一边

在于艳茹的学位遭到撤销之后，她以自己没有得到充分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北大没有为撤销其学位提供充分法律依据等理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法院在一审中，以北京大学有违正当程序原则为由，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刚刚结束的二审维持原判。法律学界普遍支持法院判决结果，最响亮的声音恰恰来自北大。事发之后，北大法学院召开了两次针对此事的专题研讨会，大多数与会法学专家认为：北大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过程过于草率，处罚过重，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应当被撤销与反思。

抄袭现象屡禁不绝，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这些深耕学界多年的学者，又有哪一位不对抄袭与剽窃深恶痛绝呢？但是，他们如今却站出来，维护一个非亲非故的抄袭者的权益，因为维护程序正义比惩治一两个抄袭者更重要。

在很多富有正义感而又单纯的人眼中，只要“坏人”能够得到惩戒，就算程序上有瑕疵也无所谓。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面前，缺乏申辩能力的个人根本不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我们觉得于艳茹抄袭证据确凿，但如果以此为由，剥夺她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那么以后如何避免其他可能清白受冤的人遭受同样的待遇呢？

今天，法院的判决结果保护的不止是抄袭者于艳茹，而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强势一方不公对待的个体。那些法学家们捍卫的是程序正义本身权威与尊严。只有看到事件表象之下的这些事实，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判决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中国青年报》2017.8.1 文/杨鑫宇